

企業權力與民主： 台灣企業集團 2008 年立委選舉的 政治獻金分析

李宗榮*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在晚近的政治社會學文獻中，企業的政治獻金分析是探討企業政治權力的一個重要取徑，然而在台灣，這類的議題仍然沒有較有系統的研究。本文以 2006 年台灣最大的 503 個民營企業集團為分析樣本，整合 2008 年第七屆立委選舉的政治獻金帳戶資訊，並透過物質利益、階級霸權以及菁英核心圈三個主要理論觀點來檢視台灣企業集團從事政治獻金的影響因素。統計分析數據顯示，集團的規模越大、家族控制的集團以及企業家族的能見度越高者，其進行政治獻金的傾向越強。此外，相較於其他產業，資訊電子業政治捐獻的程度顯著地較低。這些發現顯示以傳統產業為主的大型家族企業集團是台灣的政治獻金活動中的主導力量，也反映了台灣的市場體制中特殊的政治經濟結構特色。

關鍵詞：政治獻金、企業集團、家族企業

台灣社會學第 31 期（2016 年 6 月），頁 99-139。

收稿：2014 年 11 月 25 日；接受：2016 年 1 月 26 日。

* 通訊地址：11529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Email: zlee@sinica.edu.tw。

Corporate Power and Democracy: An Analysis of Business Groups' Campaign Contribution in the 2008 Legislator Election

Zong-Rong Lee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Political sociologists have long been analyzing political donation data of businesses to evaluate the extent to which corporate power intervenes in political processes. In this paper, the campaign contribution data of business groups in the 2008 legislator election is collected and examined with three major theoretical viewpoints: the material interest, class hegemony, and the inner circle theories. Empirical evidence shows that business groups that are larger in size, of family-owned, and feature controlling families with higher in social status are more likely to contribute to legislator candidates. Moreover, business groups operating i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are less likely to contribute.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large domestic-oriented and family-owned business groups are the key donors to political campaigns, which reflects the unique political-economic nature of contemporary Taiwan.

Keywords: campaign contribution, business group, family business

一、前言：民主政治、企業權力與政治獻金

長久以來，社會學的研究中一個核心的議題是權力在不同社會群體中分配情況是否符合民主的精神。在眾多的研究傳統中，學者們普遍認為，縱使在具有代議制選舉等民主要件的社會，權力的行使也總是不平均的；大部分的公民對於政治缺乏足夠的資源與資訊來參與，權力的行使經常集中在少數的利益群體或者菁英階層的身上 (Alford and Friedland 1985)。而其中，企業的政治權力更是學者們一致關心的重要議題。由於企業組織與企業主擁有比尋常人更多的資源，能夠透過金錢或其他資源來挹注政治活動而累積其影響，形成對於企業有利的政策環境，甚而具體地回饋至企業本身，增加其利益獲取的機會。這種情況在社會不平等且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由於經濟資源分配的懸殊而更加明顯 (Mills 1956; Domhoff 1998)。這也使得研究企業的政治權力具有其根本的重要性；學者甚至認為，探討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中政治權力集中的程度，以及民主運作是否公平與合理，歸根結柢得檢視企業在政治過程中所扮演角色 (Mizuchi and Bey 2005: 310)。

然而要確實的評估企業的政治參與程度以及可能的影響範圍，研究者需要透過完整的經驗數據進行客觀的檢視；其中企業的選舉獻金 (campaign finance) 即是一個很好的指標。在目前關於企業的政治行動與政治影響的文獻中，這是一個重要且發展中的領域。近年來，隨著先進工業化國家對於政治獻金法制規範的逐漸完備，以及社會大眾對於企業活動資訊透明的強烈要求，相關數據的客觀且完整的分析也逐漸成為可能。特別是金錢雖然不是政治影響力的唯一來源，但卻是資本主義社會中最重要影響要素之一。在 C. Wright Mills 關於美國權力精英的經典著作中，也把對於總統選舉的政治獻金視為權力菁英施展宰制的一個重要機制。他甚至認為，由於政治獻金，「使經濟權力

的掌控者可以將金錢直接轉換成政黨政治的運作」(Mills 1956: 166)。不僅如此，政治獻金也是相對來說更能夠客觀測量的行為；透過對競選的政治獻金的經驗分析，將能夠幫助研究者瞭解一個政治系統中權力影響的方向 (Burris 2010)。

在台灣，有關企業的政治獻金的研究仍在起步當中。然而這種學術理解上的空白對比於整體台灣民眾普遍對於企業政治權力的膨脹的擔憂與不滿更顯得急迫。1990 年代以降，台灣社會歷經一連串的民主化與自由化的轉型歷程，企業隨著市場的擴大而急速成長，相對於政府管制力量的減縮，企業的影響力開始由昔日政府的小夥伴，轉變成具有權力自主的群體（王振寰 1993），其影響力亦日趨明顯而廣為社會大眾所矚目（張茂桂 1992；朱雲漢 1992；林宗弘等 2011）。這種影響力也具體而微的反映在一般民眾的態度上。根據台灣歷年來的調查數據顯示，1991 年僅有大約三成多的台灣民眾贊成「政府比較支持財團而不是支持勞工」的看法；然而到了 2005 年這個比例已經超過七成，而認為政府比較支持勞工的比例不及一成。此外，1993 年的台灣社會變遷調查中，約有六成左右的民眾同意台灣的公共政策「受到大財團左右」，到了 1998 年時，同樣的問題同意的比例已經上升到八成 (81.4%)。這深刻的反映出 90 年代之後台灣的大型企業透過各種政策優惠而快速擴張，已經普遍為社會大眾所擔憂。¹ 顯然更根本的瞭解台灣的企業社群的權力影響，已是學術領域刻不容緩的工作。

目前有關政治獻金研究著墨最多的仍是以美國社會為主。美國自從 19 世紀末與 20 世紀初開始，媒體與社會大眾對大型公司與富有資本家的政治捐獻所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大力抨擊，也開啓了美國國會對政治獻金的法制的改革。到了 1971 年，美國聯邦競選方案 (The 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Act) 通過，企業得以設立公開的政治行動委員會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PAC) 做為對於政治候選人捐獻的帳戶，進一步改變了企業投入政治獻金的方式，也讓企業與富有家族的

1 見賴寧寧 (2005)。

政治獻金活動的資訊更為透明。

相較於美國對於政治獻金立法的完備與長遠的歷史，台灣一直在許多政治人物貪汙與舞弊的事件頻傳以及社會輿論的壓力之下，才於 2004 年由立法院三讀通過〈政治獻金法〉，並於當年 3 月由總統公布施行。一般民眾在 2008 年 2 月開始得以查詢歷年來選舉的政治獻金收支的詳細資訊，對於企業或個人的選舉捐款細節能有更多的瞭解。不過目前對於此相關資料的學術分析仍然不多。台灣的政治學者曾經從候選人的選舉專戶來分析候選人的政黨屬性或資歷等個人特質與獻金專戶金額多寡的關聯（王鼎銘 2007）；管理學者則利用政治獻金資料來辨識上市公司的政黨屬性，以及其對於選舉之後公司股價異常報酬的影響（張琬瑜、張凱雯 2011）。

然而企業並非鐵板一塊，其政治獻金的傾向與其組織特性、產業環境與企業所有人的個人特性息息相關。目前文獻中解釋的邏輯基本上可以歸類成三個主要取徑：首先從企業的物質利益與產業的角度來探討企業獻金傾向的影響。其次是立足於菁英論的核心圈 (inner circle) 概念，探討企業菁英在總體企業社群中的權力位置與網絡關係對於政治獻金活動的影響。最後則是階級霸權 (class hegemony) 的學說，主要是以企業經營者、大股東與其家族為分析單位，探討資本家階級的政治獻金的程度，以及內部的差異化在政治獻金與政黨傾向上的影響。總的來說，這些研究發現都反駁了多元主義對於美國政治做為一個開放社會的樂觀預期，指出在美國的政治獻金的活動中，大型企業與資本家所擁有的超乎比例的參與程度與影響力。

然而相對於美國以專業經理人為主導的企業社群，台灣的企業環境有其特殊的歷史條件與制度因素，形成台灣市場結構的特色。在企業組織的形態上，深受華人家族主義的文化遺緒所影響，以家族控制為主的企業組織一直是市場的主力；即使至今，據估計仍有近七成至八成左右的企業集團與上市櫃公司被家族所控制 (Claessens and Fan 2002; Yeh et al. 2001)。這些以家族控制為主的大型企業，早年的學者分析發現一直是台灣社會中政商關係的要角（王振寰 1993；朱雲漢

1992；彭懷真 1989；徐瑞希 1991）。而在發展國家的特殊途徑中，受到國家的大力扶持，大型且具有寡占與壟斷經驗的企業長久以來一直是台灣市場的重要力量 (Wade 1990; Amsden 1985)。就概念而言，家族企業在台灣的重要性與階級霸權理論以富有家族為核心的分析取徑有符合之處；而受國家管制政策所影響的特殊產業位置，恰好也與物質利益理論的看法相近。而企業的菁英核心圈的現象，過去也經常為台灣的政治與社會學者所關注。考察企業進行政治獻金傾向的差異，將有助於台灣學者進一步瞭解當今台灣資本主義發展中，企業權力與民主體制的意涵。

本文主要是以 2006 年台灣前 503 個大企業集團為分析樣本，並以 2008 年台灣的立法委員選舉的政治獻金專戶的資料來進行經驗分析，並透過三個主要的理論視角來檢視台灣企業的政治捐獻。隨後本文將回顧這些理論邏輯，演繹研究假設，介紹資料樣本與變項，最後報告分析結果。文末並討論西方研究與台灣經驗的異同，並展望未來有關台灣企業政治獻金相關研究的可能方向。

二、理論與研究假設

（一）物質利益與制度環境

就企業而言，對於政治獻金活動的參與，一個顯而易見的理由是企業對於經營項目利害的考量以及企業本身是否有足夠資源可以提供。這種強調企業物質資源與利益的背後是預設企業將按照成本效益的原則來考慮政治行動。在美國，最大型企業通常有比較高的比例投入政治獻金的捐獻，適當地支持了這種看法；此外企業所身處的產業集中度越高，其可能面臨到集體行動中搭便車的阻力越小，因此也更會投入獻金 (Boies 1989)。而受到國家政策影響以及政府管制的產業，企業會對於政治部門的活動更加敏感，因此也會有比較高的政治獻金的傾向。美國的經驗研究發現，事業項目特別依賴聯邦政府合約以及國防相關的企業，其董監事與高階主管進行政治捐獻的比例也比較高

(Pittman 1977)。Michael Allen and Philip Broyles (1989) 針對美國的資料也發現，石油業以及與政府有契約關係的產業的主要股東會顯著地捐獻更多，而與媒體產業相關的則顯著地較少。

物質利益的邏輯也接近組織研究中資源依賴理論的看法；企業爲了減低經營環境中的不確定性，會透過對外環境的聯繫，以鞏固攸關企業生存資源的確保；其中透過政治獻金即是企業的一種對應策略。學者認爲透過這種行動能夠減低資源依賴的壓力，並降低經營風險，長久以往可以強化企業的競爭優勢 (Pfeffer and Salancik 1978: Ch. 8)。大型企業由於特別依賴政府部門總體政策的管制，更容易受到政府部門的變動而左右，這種政治依賴上的敏感度，使得大型企業有更高的誘因進行各種對應策略的活動 (Pfeffer 1972)。

物質利益的觀點在許多看法上接近有關市場運作的制度理論的視角，特別是市場權力結構所制約出的利益條件，也頗爲符合台灣的政治經濟發展的經驗 (Fligstein 1996)。台灣大型企業的早期發展深受國家政策的優惠與保護，形成一群以國內內需市場爲主且具有寡占或壟斷位置的大型企業群（朱雲漢 1989；顏吉利 1989）。因此大型企業以及曾經享受過政府保護政策而享有優勢地位的企業會有更強的誘因來透過政治活動以鞏固自身的利益機會（林忠正 1989；Chung 2006）。從資源依賴的邏輯來看，台灣企業早期的發展由於主要的資源都掌握在公部門手中，爲了抵銷這種資源控管的力量，一種合理的策略回應是跟公部門形成各式的對應 (co-optation) 手段（李宗榮 2007）；透過政治獻金來鞏固這種影響的機會將是一個符合其利益的對應機制。

與此相較，則是台灣以外銷市場爲主，以高科技的資訊產業爲主的企業在 1990 年代之後高速的成長，成爲台灣市場環境中「新經濟」的主導力量 (Evans 1995; Saxenian 2006)。與傳統經濟相比，這些企業的發跡雖然早期曾受到國家政策的支援，然而其整體發展受到政府管制的程度已經很輕，也比較不依賴政府的資源，而更受到全球市場的競爭情勢、本身技術與經營能力所左右 (Wong 2011)。與傳統的家庭企業相較，科技電子產業在組織上更具有韋伯所謂的「理性化」的特

色。如果以物質利益理論的邏輯來考量，科技等新興產業的企業由於比較不依賴國內的市場，會有比較低的誘因來從事政治捐獻。

同理而論，企業進行政治捐獻的考慮也可能與海外生產或投資的市場區域相關。自從 1990 年代開始，台灣的產業大規模西進至中國大陸，欲借重其生產勞力與相對低廉的經營成本來成長。然而兩岸的政治環境緊張，使得這種經濟依賴與政治對立的雙重關聯引起台灣本地政治環境益形複雜與敏感，也對昔日嚴格管制的發展型國家政策形成挑戰 (Wu 2007)。晚近兩岸的局勢更逐漸演變成中國大陸政府以雄厚的經濟規模與財政能力，給予台商總總的優惠政策，無形中形成對台灣的影響力槓桿 (吳介民 2009: 149)。顯然，台灣的企業赴大陸投資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活動，在面對政策法規或在地的經營環境，以及更敏感的市場開放與貿易優惠的取得等，牽涉到更多的政治談判，同時也帶來難以預期的政治風險。兩岸日益緊密且頻繁的正式與非正式的政治協商平台，則擔負著台灣的企業西進投資，取得優惠投資條件，降低風險與增加影響力的重要機制。在這種政治與經濟扣連的環境中，赴大陸投資程度較高的企業，有更強的誘因來進行台灣本地的政治獻金的投資，以形成對政治「影響力槓桿」的潛在施力。透過以上這些對於物質利益的邏輯以及台灣本地企業發展的制度脈絡的考量，協助我們推論以下關於台灣企業集團政治獻金的數個假設：

假設 1：規模較大的企業集團，進行政治獻金的可能性較高。

假設 2：與其他產業相比，具有寡占或壟斷經驗，以及位居管制產業的企業集團，其進行政治獻金的可能性較高。

假設 3：企業集團的產品的外銷比例較高，產品屬於資訊電子業，其進行政治獻金的可能性較低。

假設 4：企業集團赴中國大陸經營的程度較高者，其政治獻金的可能性較高。

(二) 家族企業與階級政治

除了對於企業的利益成本考量之外，有關於政治捐獻的文獻中經

常出現的研究議題是對於富有家族 (wealthy families) 及其後代的政治參與的研究 (Burris 2001)。美國學者對於富有家族的政治獻金的研究起步甚早，1930 年代開始學者們就發現富有家族一直是美國總統選舉獻金的主要來源 (Lundberg 1937)。這一類的研究往後影響了權力結構研究 (power structure research) 傳統對於相關議題的一系列的論點 (Domhoff 1967, 1998)。富有家族對於美國政治的參與由來甚久，雖然其對政治競選的捐獻摻雜有許多不同的理由，但歸根究柢他們通常都希望通過競選捐獻來接近 (access) 候選人，並藉此取得政治影響力 (Allen and Broyles 1989; Broyles 1993)。在 Allen 和 Broyles 對於美國 1972 年總統選舉獻金的研究中，他們沿用社會學者 Maurice Zeitlin (1974) 的概念，以美國大型企業的主要股東做為富有家族身分的定義，這些包含企業家與其直系子孫或繼承者所組成的宗族團體 (descent group) 的成員。他們的分析發現，雖然有將近一半的富有家族的成員並沒有進行獻金活動，不過富有家族的政治獻金資源構成了當年美國總統選舉資金的主要來源。

此外，富有家族的政治捐獻與其社會地位和能見度有關。富有家族成員如果名列企業名人錄（如 Who's Who in America），或擔任企業、基金會董監事等位置，在社會中具有較高的權貴地位，也被發現有較高的比例從事政治獻金 (Allen and Broyles 1989)。這類社會地位的指標一方面反映出其本身即有積極參與社會公眾事務的傾向，因而在政治獻金活動上會比較積極；另一方面可能也因為其社會能見度而使得他們容易成為選舉候選人遊說的對象，進而被尋求提供政治獻金的支援 (Allen and Broyles 1989: 277)。而資本家階級本身也不是鐵板一塊 (monolithic)；有關的研究也發現一些其他富有家族群體內部政治捐獻模式的差異。地理區域、宗教、族群身分與特定家族的特殊經濟利益是上層階級差異的重要來源。經驗研究也顯示，在富有資本家內部存在代間的差異，這種差異特別會發生在創業第一代的企業主與繼承者世代的不同。雖然有學者認為屬於「老世家」(old money) 的富有家族與其後代會更傾向進行政治捐獻 (Domhoff 1972)，不過也有經驗研

究發現白手起家的企業主會更積極對政治人物進行投資 (Allen and Broyles 1989)。

從理論的意涵而言，大型企業與富有家族的政治獻金具有階級政治的意涵。在階級論的看法中，企業的大股東或者治理階層的家族本身就是上層階級 (upper class) 的形成要件；或者借用 Daniel Bell 的詞彙，「家族與財富的結合是布爾喬亞階級系統的社會構成」(Bell 1958: 246-249)。所謂家族與財富的結合即是我們習知的家族企業的原型；而企業或富有家族的世代的繼承與歷史的延續性無不是透過家族關係來完成，這樣的行為本身就是一種階級性的表現 (Baltzell 1958)。這也是為什麼美國的社會學者 Zeitlin 一連串關於資本家階級的理論特別強調這種從親屬與家族單位來探討資本家的階級構成 (Zeitlin 1974; Zeitlin and Ratcliff 1988)。

階級論者的這些主張主要是為了反駁管理人資本主義的命題。管理人資本主義的學者認為，工業化社會的推展將開啓社會的開放性，理性化組織的興起背後是家族企業主逐漸將管理權讓渡給專業經理人，家族企業做為一個封建社會的遺緒將逐漸被淘汰 (Bell 1960; Berle and Means 1932; Chandler 1984)。在政治權力的面向上，這與政治學的多元主義的命題不謀而合；管理人資本主義的興起，意味著傳統封建且利益整合的資本家階級的權力的式微，呼應了美國社會多元力量彼此競逐且開放的看法 (Mizruchi and Bey 2005)。然而這樣的看法，卻深受前述階級論學者的反駁。以階級論者的角度延伸來看，家族企業本身的存在，就是上層階級構成的要件；而其成員在政治領域占有權力位置的規模，則是其霸權維持的範圍 (Zeitlin and Ratcliff 1988: Ch. 5)。檢視家族企業在政治權力上的傾向恰好提供研究者檢視階級論與管理人主義／多元主義論之間的對立命題。

台灣的家族企業歷久不衰，而且許多已經歷經接班繼承的經驗，在經驗現象上符合階級論者關於上層階級的定義。從理論上來說，台灣遠非管理人資本主義所預期，市場中還是延續著濃厚的世襲社會的色彩。此外，階級論者進一步探討世家與權貴家族，經常是資本家階

級中重要且核心的組成。而台灣的大型企業家族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已經逐漸發展成為台灣社會上顯著的一個群體，這也是階級論者強調的群體認同與階級構成的要件。企業家族在企業股權的控制上不僅能夠被市場辨識，家族的社會關聯與群體的界限也廣為社會注意，認為其具有一個「統治階級」的雛形；而其社會地位更經常反映在其宗族成員的規模與親屬的關聯上（陳柔縉 1999；司馬嘯青 1987，2005；李宗榮 2011）。這些皆與前述討論的美國大型富有家族的社會階級形成的概念近似。就經驗分析上而言，檢視階級霸權理論在於比較家族控制的集團與管理人控制的集團其彼此在政治獻金上的差異傾向。而綜合前述理論概念與台灣本地經驗觀察的臆測，協助我們推論以下數個階級論相關的假設：

假設 5：相較於非家族控制的企業集團，家族控制的企業集團進行政治獻金的可能性較高。

假設 6：具有較高社會地位的企業家族其所屬的企業集團進行政治獻金的可能性較高。

（三）企業核心圈

有關企業菁英的政治參與的研究文獻中，「核心圈」(inner circle) 理論描繪的是一群超越個別企業利益的菁英團體，能夠透過企業社群內部的網絡來凝聚社群總體的共識而形成政治行動。與前述階級論者從家族的角度探討略有不同，核心圈的理論更著重考察正式的企業組織中的權力結構對於企業政治行動的影響。企業菁英核心圈的概念起自 Mills (1956) 的經典研究，隨後有 Michael Useem (1984)、William Domhoff (1967, 1998) 等人對於英、美權力菁英的一系列分析。在企業的菁英核心圈指涉的是企業社群中位居權力高層的群體，大部分由大公司或金融業的總裁、執行長或董監事所組成；而其中具有多重董監事身分的菁英，被視為企業權力金字塔中最核心的一群。Useem 的分析研究顯示，這些人對於社會與公眾事務特別積極，身兼各種企業組織領導人集結的圓桌論壇 (round tables) 的成員，以及大學或醫院等各

種非營利組織的理監事，也得以廣泛參與各種政策制定的網絡，並影響總體經濟政策的方向。因為這種全面性的視野，Useem 認為企業的核心圈人士成為企業社群利益折衝的要角，也因為這種位置，他們通常有著「泛階級理性」(class-wide rationality) 的思維，能夠跳脫狹隘的公司或產業的利益，替整體企業社群的集體利益發聲，成為整合企業社群的集體行動的重要成員。企業菁英核心圈的理論適與多元主義認為企業社群內彼此衝突的主張相反。多元主義認為企業利益無法整合，將使得政治權力的競逐更加多樣而分散，這也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權力民主的重要原因之一；核心圈理論則認為菁英之間的網絡機制，將使得企業利益能夠重整而達到一致。企業核心圈的理論在許多有關企業社群的權力結構與政治活動的經驗研究中都被證實 (Mizruchi and Bey 2005)。在美國相關的政治獻金研究中，也被廣泛確認。美國的研究顯示具有比較多跨坐的董監事，其投入遊說活動的程度也更加積極，而且他們在政治獻金的對象也更具有保守色彩，集中在共和黨的候選人身上 (Burris 1991)。英國的研究也發現，由多重董監事所形成的一個企業小群體，其在政治獻金上的程度遠高於其他的群體 (Bond 2007)。

有關台灣企業核心圈的組成特性也曾引起學者的注意。日籍社會學者沼崎一郎針對早期台灣企業的核心圈分析發現，這些企業菁英藉著董監事跨坐所形成的群體，在政治參與（例如曾擔任工商協進會的理事）與海外合作的關係，都明顯地高於一般企業而自成一格，也有別於一般的中小型家族企業的網絡連帶 (Numazaki 1986)。此外，先前對於台灣上市公司間董監事網絡的研究也發現，跨坐頻繁的董監事，特別是 1960 年代初期具有較高比例的政治活動經驗（尤其是地方性民意代表的競選），也有很高的比例受邀擔任國營事業的董監事（李宗榮 2009）。這些歷史結構特色，顯然與台灣的發展經驗中特殊的威權侍從主義的脈絡有關（Wu 1987；朱雲漢 1989）。而台灣的重要工商協會，如工商協進會、工業總會與商業總會，一直是代表台灣大型企業最重要的工商團體，也與核心圈理論所指涉的政策網絡類似

(Useem 1984; Domhoff 1998: Ch. 4)，經常具有各種與政府財經官員固定協商會面的管道，也因此成為企業主整合群體利益並且對於影響政府施政最重要的機構（徐瑞希 1991）。顯然台灣的企業菁英與政治之間的關聯緊密，習之已久且有歷史制度的脈絡可循，這些也都符合菁英核心圈理論的預期。綜合以上對於企業核心圈概念的討論，本文推論以下兩個與核心圈理論相關的假設。

假設 7：企業集團的主要公司在董監事網絡上位居於核心圈位置者，其所屬企業集團的政治捐獻的可能性較高。

假設 8：企業集團的核心人物擔任台灣三大工商協會（工商協進會，工業總會或商業總會）之理監事者，其進行政治捐獻的可能性較高。

三、2008 年台灣立法委員 選舉政治獻金分析

本文以 2008 年第七屆立委選舉的政治獻金資料做為前述研究假設的經驗測試。除了考慮到樣本資料的涵蓋與完整性之外，2000 年以後台灣適逢產業發展與政治環境開始歷經重大改變，在許多面向都適切地做為考察本文研究命題的時間點。在企業發展上，台灣的經濟已經越來越脫離昔日中小企業為主的發展形態，大型的企業與集團成為經濟的骨幹。數據顯示，2007 年底台灣前 100 大集團的總營收規模已經高達 GNP 的 137%（中華徵信所 2008a）。而在當時的產業版圖，市場發展顯示出新舊經濟勢均力敵的情況；1990 年代之後，電子業以及服務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重要。2006 年底最大的前 513 個集團中，有高達 236 個集團 (43%) 隸屬資訊電子業。而值得注意的是，家族控制仍是台灣大型企業顯著的特徵，即使歷經超過半世紀的發展，家族企業不僅沒有消失在市場的舞台，反而日益茁壯。數據顯示 2006 年台灣前 10 大集團中，扣除公股的兩大集團，其他 8 名都是家族控制

集團，其中除了台塑集團之外，其他皆為金控集團。²此外前 100 大集團中，明顯屬於家族性的集團仍高達 62 個；其總營收總額占台灣年度 GNP 的 89.1%（中華徵信所 2008a）。

不僅如此，台灣的企業隨著 1990 年代開始的赴大陸投資，於大陸設有投資事業已經成為台商的常態；根據本研究數據，至 2006 年底，台灣最大的前 513 個集團之中，只有 74 個（不及 15%）集團完全沒有大陸投資的分子公司。而且值得注意的是，2005 年底開始兩岸的政治情勢有重大的改變；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採取了一系列以政黨為主體的「國共會談」，其中台灣重要的企業集團的主要領導人皆參與其中，引起國際社會極大的關注。³隨著兩岸政治情勢的快速變化，台灣企業在中國大陸的投資利益顯然也間接地影響到企業界對於政治捐獻的態度。⁴以上這些有關企業組織於產業發展甚至兩岸投資活動等等的轉型特徵，都構成了本研究測試的適當經驗個案。

四、資料、變項與分析策略

本研究的主要樣本是台灣大型企業集團的名錄，並整合 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政治獻金專戶的企業捐獻資訊進行分析。進行企業政治獻金的量化分析，樣本的大小是否能夠充分代表企業社群的總體特性並能進行適當地推論是學者重要的考量 (Allen and Broyles 1989:279;

-
- 2 其排名順序分別是：國泰金控、合作金庫銀行、台新金控、兆豐金控、中信金控、台塑、富邦金控、華南金控、新光金控、第一金控。
 - 3 連戰於 2006 年 4 月以國民黨榮譽主席的身分帶領台灣的企業界人士參與第一次的「國共經貿論壇」；同行團員除了台灣的政治人物以外，並有如辜濤松、嚴凱泰，長榮前董事長張榮發之子張國政，富邦金控董事長蔡明忠，中華民國中小企業協會理事長戴勝通等台灣重要的企業界人士參與。坊間媒體統計該代表團的團員達到 200 人以上，隨行的企業家所代表台灣企業的總市值達到全台灣產值的 48%。
 - 4 另有關台灣本地企業人士進行選舉捐獻時考量大陸投資市場利益的觀點見《聯合報》記者陳志平 2006 年 7 月 12 日報導〈大額捐款，仍不得馬門而入〉：「企業界希望搭國共平台的順風車，進一步拓展大陸市場。在今年四月國共經貿論壇，台灣紅頂商人不分藍綠爭相參加，除了早有台商循前國民黨政府要員，成功突破大陸對醫療等若干敏感領域的市場限制外，日昨大陸十二家台商獲得大陸華夏銀行首批二百億人民幣貸款，更讓台商相信，跟國民黨靠攏將有助其『西進』，據了解，不少台商捐款給國民黨後，因此也會『不經意』地讓大陸相關部門知道。」

Boies 1989)。本研究的企業集團的分析樣本取自於 2008 年中華徵信所出版的《台灣地區大型集團企業研究》以及《台灣地區中型集團企業研究》，該兩本名錄為 2006 年底蒐集的數據。歷年來此類出版皆局限於百大集團，2008 年該公司擴大蒐集範圍，出版大型集團名錄（含 300 家集團）與中小型集團名錄（含 213 家集團）。本研究整合此兩本名錄，並排除依法不能進行政治獻金的 10 個公股控制的集團，共蒐集 503 個集團為最後分析樣本；這是目前有關台灣企業集團名錄收錄範圍最廣的一次，也更能充分代表台灣企業社群的實質範圍。這 503 個集團涵蓋的全球事業的資產總額為 45 兆 4,000 億，營收總額為 19 兆 1,000 億，總體經濟實力遠超過台灣 GNP 的 12 兆。

相較於西方研究文獻經常以公司為分析單位，本文以企業集團為分析單位主要是考量到以下幾個原因。首先，台灣的企業家族通常以集團的組織形式運作；集團的形態通常也更實質的顯現企業家族利益的控制範圍 (Granovetter 2005; Luo and Chung 2005)。這種以家族為凝聚單位的組織形態，在世界其他各國的市場中頗為普遍 (Khanna and Rivkin 2006)。早年的政治經濟學者也普遍認為企業集團是觀察企業政治行動的一個適當的單位（朱雲漢 1992）。此外，本文探討的階級理論等分析概念也經常是以家族為基礎，也說明了家族集團的分析單位的適用性。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台灣早年的市場發展過程中，企業集團由數個家族合夥經營的個案屢見不鮮（Numazaki 2000；謝國興 1999），本研究在分析上仍然區分並控制這種不同股權形態對於政治獻金傾向所可能帶來的差異影響。而另外一個以集團而不是公司做為分析單位的原因，主要是台灣的企業主在各種選舉中，經常是透過集團旗下的子公司來進行捐獻，以迴避同一個公司對於單一候選人捐款不得高於 300 萬的限制。⁵ 以集團而不是公司做為政治獻金的分析單

5 例如 2008 年台灣總統大選結束後，媒體統計企業捐獻給兩大陣營的政治獻金，發現企業集團通常都動用集團下公司的名義來捐款。其中台塑集團捐給國民黨候選人陣營達 1,400 萬元；元大集團捐給民進黨陣營達 600 萬元；遠東集團捐給國民黨候選人達 4,400 萬元，民進黨則 1,800 萬元（見《聯合報》2009 年 2 月 17 日報導）。

位似乎更能觀察到台灣的企業主在政治參與上的實際運作方式。

（一）政治獻金資料與依變項

本文政治獻金資訊來源是監察院的財產申報處《政治獻金會計報告書》。本研究根據的是 2008 年立委選舉所有候選人捐獻專戶的數據。在這些候選人捐獻專戶的明細中，本研究首先以前述中華徵信所的企業集團名錄旗下的子公司名單比對各候選人政治獻金專戶中企業集團相關子公司是否曾經進行政治捐獻金額；本文隨後的統計分析將以這個虛擬變項（1 或 0）做為主要依變項進行統計分析。

（二）自變項

本文的集團資訊乃根據前述中華徵信所 2008 年出版之名錄，其他不足之資訊則參考《台灣經濟新報》的企業資料庫中企業集團的模組，以及其他如經濟部商業司之公司登記資料補足。本研究的數據以集團為測量單位，然而有些變項因為數據不可得，因此以集團的核心公司的數據替代。集團的核心公司通常為集團中規模最大或者成立歷史最悠久，也常是整個集團控制的關鍵，可視為集團的旗艦。

有關企業集團與產業於組織特性定義分別如下：集團規模為 2006 年之營收總額，單位為新台幣億元；本文分析時採用自然對數對該變項做轉換。根據物質利益的邏輯，企業集團的規模越大，在政治捐獻上的可能性會比較高。為了考察具有管制產業背景的集團與具有科技背景的集團在政治捐獻程度上的差異，本文建立集團所屬產業別之變項，比對集團所經營之行業隸屬於資訊電子業、金融業或其他產業等三類；比對的資訊來源是前述中華徵信所的集團企業名錄中的產業分類。該變項為類別變項，在進行迴歸分析時另外形成兩虛擬變項（資訊電子業與金融業）而以其他產業為對照組。⁶ 資訊電子業具有高科

6 對於台灣集團企業的產業分布有興趣的讀者應當留意本文目前的分類對於多角化程度較高的集團，可能無法完全適用。一個可能的解決方式是在進行統計分析時，將集團企業的多角化程度做為控制。此外從理論邏輯上探討集團經營多角化與政治獻金的關聯也是一個待探索的議題。

技產業之特性，而金融業由於台灣特殊的政經發展歷史，本研究認為其具有管制產業的經驗意涵。根據假設，這兩者會對於企業集團形成政治捐獻產生相反的影響。另外是集團的年齡，該變項計算集團核心公司至 2006 年時之成立年數。

企業集團的物質利益相關變項則有以下：集團的外銷比例，其可以被視為集團不依賴國內內需市場的程度，測量的是核心公司的外銷比例，該數據則來自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集團的壟斷或寡占經驗程度則參考 1992 年公平交易委員會出版的《公平交易統計年報》所列舉之獨占事業與寡占事業（市場占有率達五分之一以上）兩種名單（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1992）。根據該名單，本文比對集團內子公司是否曾被列為獨占或寡占事業，有則編碼為 1，無則為 0。由於公平交易委員會在 1992 年之後即停止公布調查名單，此名單為本研究可能找到之最接近分析年分之資訊。此外，有關企業集團赴大陸投資的變項，本文採用中華徵信所的企業集團赴大陸投資的分子公司數。前述假設預期集團的內銷程度越高、曾有寡占或壟斷經驗、在大陸設置有分子公司數目越多者，則其會有更高的政治獻金傾向。

企業集團的家族控制程度方面，本文首先依據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中的分類，採用其中的單一家族主導與共治形態兩個主要類別；後者接近學者所謂合夥制的控制模式。⁷ 由於經歷上述兩種較為顯著的篩選標準之後，仍然有很高比例的集團其子公司的董事會中仍然具有家族董監事的成員。因此本文另外檢查非屬於上述單家族或家族共治的集團中，核心公司的董事會成員中是否具有一位以上的家族成員，若有則另外編碼定義為折衷型控制類型，將之視為具有家族的性質但在控制權上還沒有達到緊密控制的程度，或家族控制無法被清楚辨識

7 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認定家族控制的標準是以公開說明書或年報所揭露的二等親以內家族與姻親成員為判斷資訊，條件為家族至少有兩人以上出任集團旗下公司的董監事或高階經理人（經理以上）職位。其定義單一家族控制的條件有以下四項：(1)董事長及總經理由單一家族成員出任；(2)董事控制席次比例大於 50%；(3)董事控制席次比例大於 33%且最終控制的家族中其成員至少有 3 人出任董監事及經理人；(4)控制持股比例大於必要控制持股比例。

的集團。其他非屬於以上三類之集團則定義為非家族控制類型；這一個類型可以視為專業經理人控制的形態。根據前述假設，企業集團的家族控制越顯著，則其政治獻金的可能性也越高。

有關企業家族的地位，本文依照前述有關家族的宗族成員的規模與親屬的複雜度所反映出來的能見度的概念（陳柔縉 1999），檢視中華徵信所出版的名錄中是否列有集團中家族成員之親屬表做為企業家族地位的指標；有則編碼為 1，無則為 0，以定義大家族的存在。根據中華徵信所編輯說明，當集團核心人物與其他家族成員皆為集團內高階主管時，則收錄在家族親屬表；雖然如此，在台灣一般企業家族系譜能被辨識仍取決於市場人士與一般社會與媒體對於該經營家族之關注，而能有相關親屬資料的蒐集整理與家族親屬表之呈現。考察此市場慣習，本文將此親屬表之列舉視為集團控制家族的地位顯著性之指標。依照前述假設，家族地位較高的集團其政治獻金的可能性將會較高。

企業菁英核心圈的概念本文參考先前研究，以兩個變項來進行測量 (Allen 1991: 683; Useem 1984)。首先本研究計算每一個企業集團其核心公司在 2006 年全部上市櫃公司中所出現的董監事跨坐的數目，並以至少具有三席跨坐董監事為準，建立二元（1 或 0）的虛擬變項；本文稱此變項為董監事核心圈。其次本文參考 Useem 所指涉的美國企業「圓桌論壇」等企業協會的概念，檢視樣本中集團的核心人物是否擔任 2006 年的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中華民國工業總會以及中華民國商業總會這三個傳統上被視為台灣最重要的工商團體的理監事（含理事長與副理事長、常務理事等）。如果曾出任任何一個協會之理監事則編碼為 1，若無則 0；本文稱此為工商團體核心圈。根據假設，董監事核心圈與工商團體核心圈的屬性都將使企業集團有更高的政治獻金的可能性。

（三）分析策略

本研究的主要依變項是企業集團是否在 2008 年的立委選舉中有

進行政治獻金的捐獻（1 或 0）。由於政治獻金的有無為二元虛擬變項，本研究參考先前研究以二元邏輯迴歸模型進行估計 (Allen and Broyles 1989)。對二元虛擬變項，一般線性迴歸 (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 無法正確估計迴歸方程式中自變項的參數，學者一般使用 Logistic 或者 Probit 等迴歸。本研究採用的是 Logistic 迴歸。⁸ 在本文的迴歸分析中，考慮到有些變項之數據無法完整取得且有較高數目的遺漏值（如外銷比例），本研究遵循傳統控制遺漏值的方法，皆先將遺漏值以 0 替代，另外分別以單獨的虛擬變項控制了遺漏的觀察值所可能造成估計上的偏誤；然為了精簡報告，表格中不另外說明。

（四）分析結果

表 1 呈現本文分析的樣本在組織特性、產業以及控制形態上的分布，以及不同特性的企業集團在政治捐獻上的情況。透過我們對政治獻金與企業資訊的比對，在全部 503 個集團中，發現有 145 個集團有進行政治獻金的活動，占樣本的 28.8%。總體來說，並非台灣的企業

8 在二元變項的分析中，由於事件發生是以有或無的方式被觀察到，因此一個可能的模型設定是線性機率模型(linear probability model)。然而在線性機率模型中，數值被限制在 0 到 1 之間，並不理想，預測的機率也有可能大於 1 小於 0，也不恰當。這些問題可以進一步將機率轉換成勝算(odds)修正。在這個模型中估計的是一個事件發生的勝算與沒有發生的勝算之間的比值。假定一個事件 y 發生的機率(p)是 .8，沒發生的機率($1-p$)是 .2，則 y 發生的勝算就是(p)/($1-p$)=.8/.2=4。機率與勝算之間是個 monotonic 的關係，意味著隨著機率增加勝算也會增加。然而勝算的值介於 0 與 $+\infty$ 之間，也仍然不理想；這可以再進一步將勝算取自然對數做轉換，使得 y 的值介於 $-\infty$ 與 $+\infty$ 之間。這個轉換學者稱為邏輯(logit)轉換；邏輯迴歸模型讓研究者得以設定一個二元變項與一組預測變項之間的線性關係，並能夠透過最大概數方法(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對於變項的參數進行估計：

$$\text{logit}(p) = b_0 + b_1 X_1 + b_2 X_2 + b_3 X_3 + \dots + b_k X_k$$

$$\text{其中 } \text{logit}(p) = \ln\left(\frac{p}{1-p}\right)。$$

由於 logistic 迴歸的估計係數是經過自然對數轉換過的係數，因此學者通常建議將係數取指數轉回成勝算比(odds ratio)進行詮釋。在這邊，勝算比指的是預測變項每一個單位的增加（或者性質的改變，如性別），在 y 變項上發生的勝算的相對增加的幅度。由於估計的係數是勝算的比值，如果預測變項 x 的估計勝算比等於 1，意謂 x 變項每一個單位的增加（或者性質的改變）對於 y 事件發生與沒有發生的勝算值相當，也意謂著 x 沒有任何影響。如果大於 1 則意謂著 x 對於 y 事件的勝算是正向的影響，小於 1 則是負向的影響。隨後本文的統計分析結果將以勝算比呈現。有關 logistic 迴歸的介紹以及係數的解釋請參考 Long (1997)。

表 1 集團特性與立法委員政治獻金分布

	集團數（個）	有政治獻金集團數	政治獻金（%）
全部樣本	503	145	28.8
規模			
大集團（1~50）	50	30	60.0
中集團（~200）	150	50	33.3
小集團（~503）	303	65	21.5
控制形態			
單一家族	216	88	40.7
多家族	46	12	26.1
折衷型	175	39	22.3
非家族控制	66	6	9.1
家族地位			
高地位家族	127	67	52.7
產業			
金融業	21	10	47.6
電子資訊業	236	35	14.8
其他產業	246	99	40.2
寡占或壟斷經驗	33	19	57.6
核心圈			
工商協會核心	59	31	52.5
董監事核心	124	29	23.4
中國大陸投資			
無投資	73	23	31.5
子公司少（1~3）	204	52	25.5
子公司中（4~6）	113	25	22.1
子公司高（6~）	113	45	39.8

集團都從事政治獻金。不過，如果把樣本依據其規模的大小並以一個接近金字塔結構的分布方式分為三群，則可以看到位居前 50 大的大型集團在政治獻金活動上更為活躍；有六成的集團（60%）進行這樣的活動，遠高於中型集團的 33.3% 與小型集團的 21.5%。在控制形態方面，單一家族控制的集團有接近四成（40.7%）進行政治獻金的活動，高於其他三種不同的控制形態。特別是非家族控制的集團其進行政治

獻金的比例異常地低，僅有 9.1%；這個比例也比其他多家族控制（合夥制）的 26.1% 與折衷型控制的 22.3% 低很多。大致而言，數據的分布模式呈現出家族控制形態越顯著而單一，則企業集團進行政治獻金的比重也比較高的趨勢。此外，數據也顯示家族地位比較顯著的集團，其參與政治獻金活動的比重也不尋常的高，超過了一半（52.7%）家族地位顯著的企業家族有進行政治獻金。

其他與政治獻金活動呈現比較顯著關聯的組織特性還有：曾受過政策保護且享有優勢市場地位的集團有接近六成（57.6%）進行政治獻金，遠高於全部樣本的 28.8%；而位居金融與證券業的集團則有接近五成（47.6%）進行政治獻金；此外核心人物具有工商團體核心圈的身分（亦即擔任三大工商協會的理監事）的集團，有超過五成（52.5%）會進行政治獻金。值得注意的是具有董監事網絡核心圈身分的集團當中，僅有 23.4% 進行政治獻金；這與前述的理論假設的預期不同。最後，將企業集團以大陸分子公司數的多寡分為四群後統計其政治獻金的比例，發現有最多子公司的集團，其政治獻金活動的比重最高（39.8%），隨後是完全沒大陸子公司的集團（31.5%）。僅有較少或中等的大陸分子公司的集團則在政治獻金的比重上比較低。以上這些數據的分布，除了企業董監事核心圈的數據與前述假設的預期方向相反之外，其他大致與假設預期的方向一致。

表 2 列舉了 2008 年立委選舉中捐獻總額最高的前 30 個企業集團的排名及相關的組織與核心人物的資訊。2008 年立委選舉捐獻總額最高的集團是遠東集團，金額高達台幣 4,000 萬元台幣；第二名是裕隆集團，捐獻總額為台幣 1,700 萬元，其他前 10 名依序為遠雄國際、嘉新水泥、華新麗華、仰德、中國信託、台灣塑膠、威京，以及金鼎證券等集團。從名單看來，捐獻金額甚高的集團不乏資產規模巨大的集團，如中國信託與台塑集團資產總額都達到兩兆，而捐獻金額最高的遠東接近一兆。這些集團的核心人物清一色是台灣商業赫赫有名的企業家族；有一些是第一代的創業者，例如台塑集團的創辦人王永慶、統一集團的高清愿，以及於 2014 年因為合宜住宅行賄案而被聲押的

表 2 台灣企業集團 2008 年立法委員政治獻金總額排名（前 30 名）

排名	集團	捐獻金額 （百萬）	捐獻 人數	核心 人物	核心 產業	成立年	資產總額 （百萬）	資產 排名
1	遠東	400,000	43	徐旭東	棉紡紗	1954	979,455	12
2	裕隆	177,100	22	嚴凱泰	汽車	1953	359,778	29
3	遠雄國際	76,088	15	趙藤雄	營造建設	1978	167,642	48
4	嘉新水泥	75,100	10	張永平	水泥	1954	36,941	97
5	華新麗華	60,000	11	焦佑倫	電線電纜	1966	372,977	25
6	仰德	58,000	11	許育瑞	發電機	1955	47,216	82
7	中國信託	56,500	10	辜濂松	金融	1966	2183,360	5
8	台灣塑膠	53,000	9	王永慶	石化	1954	2127,873	6
9	威京總部	51,000	18	沈慶京	建築投資	1987	91,895	63
10	金鼎證券	49,500	25	張平沼	金融	1988	81,883	67
11	耐斯	48,378	7	陳鏡村	清潔用品	1966	265,616	34
12	味丹	46,995	22	楊頭雄	調味品	1962	31,033	104
13	寶來證券	43,000	11	白文正	金融	1988	95,306	59
14	太子汽車	43,000	10	許顯榮	汽車	1965	25,613	118
15	統一	41,276	18	高清愿	食品	1967	303,077	32
16	大眾銀行	40,000	6	簡明仁	金融	1992	388,683	24
17	元大金控	37,000	7	馬志玲	金融	1961	573,763	17
18	力麗	35,500	10	郭紹儀	人造纖維	1979	44,383	84
19	聯華神通	32,000	5	苗豐強	食品系統整合	1956	249,398	36
20	南港輪胎	30,000	3	翁文雄	橡膠	1959	14,318	168
21	櫻花	30,000	4	張宗明	瓦斯爐	1988	6,447	335
22	幸福水泥	29,000	7	陳兩傳	水泥	1974	9,211	221
23	金仁寶	27,000	6	許勝雄	電腦光電	1973	364,846	28
24	日月光	26,500	10	張虔生	半導體	1984	176,601	46
25	興富發	26,000	7	鄭欽天	建築投資	1980	23,512	127
26	宏泰	26,000	6	林增璘	金融營建	1993	401,826	22
27	康和證券	26,000	5	鄧序鵬	金融	1990	20,702	302
28	冠德建設	25,700	7	馬玉山	營建	1986	16,154	307
29	上銀科技	25,000	4	卓永財	軸承齒輪	1989	6,489	334
30	潤泰	21,000	5	尹衍樑	棉紡紗營造	1976	138,114	51

遠雄集團的趙藤雄。不過更多的是家族企業第二代的接班人，如遠東集團的徐旭東、裕隆集團的嚴凱泰、嘉新集團的張永平、華新麗華的焦佑倫、太子汽車的許顯榮、潤泰集團尹衍樑。有些甚至是企業家族

的第三代如仰德集團的許育瑞。而這些著名的企業主有些更不乏政治經驗，有些早年更曾擔任過如國民黨的中常委或中央委員等要職。值得注意的是，捐獻最高的前 30 個集團，電子科技業主寥寥可數。這個表格大致補充了前述的資訊，顯現最積極進行政治獻金的是以傳統產業為主的大型家族集團。

透過前述的數據分布我們看到企業的組織特性與所位居產業、家族控制程度以及核心圈屬性都與集團的政治獻金具有高度的關聯。然而，這些因素對於企業政治獻金的淨影響程度為何？特別是本文所關心的數個重要解釋變項彼此之間具有互相影響的可能性。例如台灣的大型家族企業發展甚久，有其特殊的歷史條件，特別容易在管制產業內發展，並在傳統與內需性的特許產業中達到寡占或壟斷的地位；而科技電子產業則與家族控制的治理形態彼此具有顯著的互斥關係，也更少受到早期發展過程中政治因素的影響。此外，大型家族集團也被發現是台灣企業協會組織的重要參與者。這些考量意味著有必要透過迴歸分析的架構來進一步釐清本文主張的解釋因素的分別影響。

表 3 與表 4 是迴歸分析所使用變項的描述統計以及變項間的相關係數。表 5 則報告關於企業集團是否進行政治獻金的二元邏輯迴歸分析的結果。其中雙變量分析顯示的是每個變項單獨於迴歸方程式中對於依變項的影響效果。數據顯示，除了董監事核心圈以及共治型的家族集團之外，其他變項的影響效果與方向大致符合本文的預期。而模型 1 至 5 則是多元迴歸的模型分析。迴歸模型 1 放入企業組織的基本變項，包含了集團規模與年齡。而模型 2 則依序加入了集團的產業別，意即是否位於管制性的金融業或者屬於資訊科技產業（以其他產業做為對照組）、集團的外銷比例、集團的經營是否有寡占或壟斷的經驗，以及最後集團在中國大陸的分子公司數。這些主要是物質利益理論相關的變項。模型 3 則分別放入核心公司的董監事網絡核心圈以及工商團體核心圈兩個虛擬變項。模型 4 則放入企業控制形態相關的變項，分別是單一家族控制、多家族控制、折衷型家族控制，而以非家族（專業經理人）控制做為對照組。最後則是放入企業集團的家族

表 3 描述統計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1. 政治獻金	0.28	0.45	0	1
2. 規模（營收）	9.20	1.32	5.07	14.29
3. 集團年齡	29.07	12.36	3	63
4. 資訊電子業	0.46	0.49	0	1
5. 金融業	0.04	0.20	0	1
6. 外銷比例	48.88	38.29	0	100
7. 壟斷或寡占經驗	0.06	0.24	0	1
8. 中國大陸公司數	5.57	9.96	0	116
9. 工商協會核心	0.11	0.32	0	1
10. 董監事核心	0.24	0.43	0	1
11. 單家族	0.42	0.49	0	1
12. 共治型	0.09	0.28	0	1
13. 折衷型	0.35	0.48	0	1
14. 經理人控制	0.13	0.33	0	1
15. 高家族地位	0.25	0.43	0	1

表 4 司皮爾曼相關矩陣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														
(2)	0.20													
(3)	0.23	0.13												
(4)	-0.29	-0.01	-0.51											
(5)	0.08	0.07	-0.03	-0.19										
(6)	-0.14	0.00	-0.21	0.46	-0.25									
(7)	0.16	0.32	0.32	-0.23	0.06	-0.16								
(8)	0.07	0.37	0.13	-0.06	-0.02	0.07	0.22							
(9)	0.19	0.24	0.24	-0.23	0.17	-0.15	0.27	0.08						
(10)	-0.06	0.16	-0.15	0.16	0.04	0.04	0.01	0.04	0.06					
(11)	0.22	0.16	0.25	-0.22	0.10	-0.09	0.12	0.10	0.22	0.00				
(12)	-0.01	-0.04	0.05	-0.09	0.14	-0.12	0.11	0.01	0.03	0.09	-0.27			
(13)	-0.10	-0.16	-0.12	0.13	-0.13	0.15	-0.13	-0.08	-0.18	-0.13	-0.65	-0.23		
(14)	-0.16	0.15	-0.33	0.35	-0.08	0.17	-0.10	0.02	-0.08	0.21	-0.33	-0.12	0.12	
(15)	0.30	0.47	0.31	-0.26	0.13	-0.11	0.23	0.26	0.30	-0.00	0.34	-0.10	-0.17	-0.19

表 5 集團企業立委選舉政治獻金活動之邏輯迴歸分析

[exp (B): 勝算比]

模型	雙變量	(1)	(2)	(3)	(4)	(5)
組織特性						
規模（營收）	1.39**	1.32**	1.39**	1.31**	1.18†	1.26**
	(.10)	(.10)	(.13)	(.10)	(.10)	(.14)
集團年齡	1.04**	1.03**	1.01	1.03**	1.02*	.99
	(.01)	(.01)	(.01)	(.00)	(.01)	(.01)
產業 a						
資訊電子業	.24**	--	.27**	--	--	.35**
	(.05)		(.07)			(.10)
金融業	2.34†	--	1.25	--	--	.99
	(1.04)		(.61)			(.52)
外銷比例	.99**	--	.99	--	--	.99
	(.00)		(.00)			(.00)
壟斷或寡占經驗	3.71**	--	.84	--	--	.85
	(1.36)		(.37)			(.39)
中國大陸公司數	1.03**	--	1.01	--	--	1.01
	(.01)		(.01)			(.01)
核心圈						
工商協會核心	3.20**	--	--	1.77†	--	1.17
	(.90)			(.57)		(.39)
董監事核心	.69	--	--	.61†	--	.69
	(.16)			(.15)		(.19)
家族控制形態 b						
單家族	2.77**	--	--	--	5.72**	5.17**
	(.56)				(3.19)	(2.99)
共治型	.85	--	--	--	4.00*	3.43†
	(.30)				(2.56)	(2.30)
折衷型	.61*	--	--	--	3.66*	3.56*
	(.13)				(2.05)	(2.06)
高家族地位	4.26**	--	--	--	2.23**	1.81*
	(.93)				(.59)	(.50)
常數		.01**	.02**	.01**	.01**	.02**
		(.01)	(.01)	(.01)	(.01)	(.01)
N		503	503	503	503	503
Log Likelihood		-281.62	-267.27	-278.32	-266.24	-255.76
Pseudo R-squared		.067	.115	.078	.118	.153

†<.1, *p<.05, **p<.01

a 對照組為其他產業；b 對照組為非家族控制

能見度（大家族）。這些主要是階級論者考量的因素。模型 5 則是把上述的全部變項全部放入同一個迴歸方程式中，可以視為最終的模型。

表 5 的模型中，隨著變項的陸續增加，模型的適合度也逐漸提高。與模型 1 的基準模型相較，物質利益與階級理論的變項的加入對於模型的改善程度比較高，Pseudo R-squared 的值分別提高了 72% 與 76%，而核心圈理論的變項則僅增加 16%；最後三組變項皆置入的模型適合度則改善更多，高達 128%。最後的模型對於我們關心的集團企業政治獻金的行動具有 15.3% 的解釋能力。而根據這些模型的分析結果，首先我們發現，企業集團的政治獻金受到基本的組織因素所影響。例如，企業集團的規模越大，成立的時間越久，則其對於立委選舉進行捐獻的可能性就越高；企業規模的變項在全部的模型中都顯現一致且持續的影響。企業的規模意味著潛在可以動用的資源，資源越多其可以進行政治捐獻的餘裕自然也越高。而企業集團成立的時間與政治獻金的活動也呈現正相關，可能與台灣的經濟發展歷程有關。成立時間越久的企業越可能受到早年經濟政策受政治力高度管制的影響，而有比較強的政治敏感度，進而比較傾向進行政治獻金的行為；另外可能是老牌的企業有比較高的能見度而容易與政治人物有往來，而成為募款的對象。集團規模的顯著影響基本上肯定了物質資源邏輯的預期；其他在模型 2 中的相關變項還包括產業因素、經營的歷史中是否有壟斷或寡占經驗、外銷程度的高低，以及集團在中國大陸的分子公司數。這幾個變項，雖然在單獨的雙變量迴歸分析中都呈現顯著的作用，不過在加上集團的規模與年齡等組織因素之後效果都顯著地縮小或消失。其中的例外是企業集團是否屬於資訊電子業，不管加入其他哪些變項，該因素都顯現對政治獻金行為顯著的負向影響。資訊電子業的效果符合前述的假設。

而在模型 3 中我們則探討了有關企業核心圈的因素對於政治獻金活動的影響。前述的假設預期企業集團主如果有擔任三大工商團體的理監事代表，以及企業集團的旗艦公司董事會如果有較高數目的網絡

連接，這樣的集團將會有比較高的可能性進行政治獻金。不過數據分析的結果略有不同。其中工商團體核心圈的身分與政治獻金的可能性呈現正向的關係，而董監事核心圈則相反，呈現負向的相關；兩者的顯著程度都在邊際之間。與前述的分析頗為類似的是，雖然在雙變量的模型分析中變項的顯著程度都很高，然而一旦加入組織的資源與成立年齡等變項之後，核心圈兩個相關變項其顯著程度皆大為降低。其中工商團體核心圈的效果與前述假設預期一致，而董監事核心圈的效果則與前述假設相反。

最後，我們討論企業集團的控制形態與家族地位等因素對政治獻金行動的影響。其中就控制形態的變項而言，與非家族控制（專業經理人控制）的企業集團相較，受到單一家族控制的企業集團其進行政治獻金的可能性最高，其次是多家族控制（合夥制），以及折衷型控制的企業集團。如果多元主義／管理人主義的命題是有效的，那麼我們應該會觀察到，與家族控制的集團相比，管理人控制的集團應該會在政治獻金上顯現更強的傾向，或者不分軒輊；然而數據顯示正好相反。家族控制的集團不僅具有比較高的政治獻金的傾向，統計估計的數據也意涵著企業集團的家族控制模式的顯著性與政治獻金的可能性成正向的關係。此外，企業集團具有比較高的社會地位，家族親族關係越顯赫者，其政治捐獻的機會也比較高。這些結果都與前述假設的預期一致。

比較最後的模型 5 與前述的模型發現，變項的效果與方向大體上都一致，不過集團年齡與本就介於邊際效果的核心圈的兩個變項其效果都不再顯著。在最終的模型中，階級理論關心的家族控制與家族地位的變項以及物質利益關心的組織規模與產業（電子資訊業）的效果都仍然持續顯著地影響著。以模型 5 的估計係數為基準，在其他條件都不變的情況下，與專業經理人控制的集團相較，台灣的集團企業參與政治獻金的勝算比，受單一家族控制的集團增加 4.17 倍，受多家族控制的集團增加 2.43 倍，而折衷型家族控制的集團則增加 2.56 倍。而具有較高社會地位的家族集團與其他集團相較，參與政治獻金的勝

算比則增加了 81%；而電子業的集團與非電子業的集團相較則其參與政治獻金的勝算比減少 65%。在這三群的解釋變項中，企業集團的家族控制形態以及企業家族的地位都是影響其政治獻金活動非常顯著的因素，其他如組織的資源規模以及所身處的產業是否屬於資訊電子產業的影響力量，這幾個變項自始至終都是政治獻金顯著而強烈的影響因素，不管在什麼模型中其效果的變化都頗為一致。其他如菁英核心圈的因素、中國大陸投資的程度，以及寡占或壟斷的經驗都在加入了控制形態與企業規模或產業的因素之後，變得薄弱或不具顯著性。這意謂著本文所分析的變項之間具有相關或有交互中介的效果。⁹ 這也可能反映了台灣企業組織與政商環境的歷史演變的途徑與影響：家族企業或者大型的集團本身就是具有比較強的參與工商協會的傾向；而正如前述，這類企業也在台灣長時期的歷史發展中受到保護且比較有機會成為寡占或獨占的優勢位置。一旦我們控制了控制形態、規模、發展歷史以及產業位置等因素，核心圈以及其他物質利益因素就失去其解釋效力。¹⁰

五、結語：企業社群階級政治的浮現？

本文回顧目前西方有關企業與富有家族政治獻金的研究，並整理三個主要理論視角來檢視台灣企業集團政治獻金的影響因素。數據分析顯示台灣企業集團的政治捐獻並非一個隨機的過程，而是深受組織資源、所身處的產業特性、大陸市場投資的程度等經營利益的考量所左右；而企業社群內部的組織動力、企業的控制形態與企業所有人的家族地位等社會因素更是重要的原因。本文的統計分析發現，三個主

9 為了進一步排除本文分析模型的解釋變項間沒有高度共線性(collinearity)的問題，筆者另外針對這些解釋變項進行了共線性的診斷。根據診斷結果，每個變項的變異數膨脹因素(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的值都明顯小於 10，這意謂本文的解釋變項之間沒有嚴重共線性的問題。診斷分析的數據請參考附錄。

10 為確認並補充本文分析的可信度，筆者曾另以集團的捐獻金額進行多元迴歸分析（依變項為集團捐獻總額加 1 再作對數轉換）；分析結果中變項的顯著程度和方向與表 5 的邏輯迴歸分析完全一致。該分析結果可與作者通訊洽詢。

要的理論都不同程度的解釋了台灣企業集團的政治獻金行為；雖然階級霸權以及物質利益的相關變項其解釋效力相對來說更強。綜合來看，企業所身處的產業特性、組織資源、治理結構與家族地位更根本地影響了廠商進行政治獻金的原因。顯然，政治權力的影響機會是一個不平等的金錢遊戲。擁有更多的財務資源，必然是這個權力遊戲的主導者，我們的研究數據也再次證明了這個命題。有趣的是，深刻影響當今台灣企業發展的全球化力量，也反映在對於政治活動的參與上。以全球市場為競爭對象的科技產業，遠遠地離開了台灣金權政治的遊戲；而傳統的市場文化所促成的特殊形態的家族企業則是台灣政治金權遊戲中顯赫的要角。

家族資本主義在台灣興起有其制度環境與歷史發展的脈絡，而時至今日我們似乎仍不見其式微的跡象。而正如已故美國社會學者 Bell 所言：「家族與財富的結合正是封建社會的標誌。」其世代的繼承與家族內財富累積的性質，正與民主社會中機會開放的精神相悖 (Bell 1958)。事實上在台灣市場中非常顯著的家族企業，在全球的市場發展中並非特例 (La Porta et al. 1999)；家族企業更被發現經常是發展中市場裏政商關係的要角。晚近研究全球家族市場控制的經濟學者發現寡占家族控制程度高的國家，通常官僚效率低、金融市場功能較不完善、政府介入市場的程度高（以公營事業的比例衡量），而且政治上的競租 (rent-seeking) 活動更活躍 (Fogel 2006)。換句話說，大型寡占的家族控制形態特別容易在不完備的制度環境中存活而壯大；學者甚至認為「之後這些家族更可能利用經濟上的權力來攫取政治上的優勢，進而影響制度的發展以保有其既得利益，阻斷競爭與創新，最終抑制經濟發展」(Fogel 2006)。本文的發現呼應了寡占家族控制與政治權力鞏固之間的緊密關聯。在台灣日益階級分化，大型家族企業逐漸主宰台灣市場與政治環境並凌駕各種社會力量的現在，這無疑是一個值得學者關心的現象。

在理論文獻上，本文的經驗發現中有值得未來研究者思索之處。首先是本文的分析顯示，企業集團的家族控制類型與政治獻金的傾

向、金額多寡相關。為何跟單一家族控制的集團相比，合夥制與折衷型控制的家族企業集團政治獻金的傾向比較弱？一個可能的原因也許是潛在的股權紛爭，導致家族代表的利益容易變動也間接使得政治利益的回饋難以預期；此外，政治捐獻也可能因為家族數目的龐雜而導致共識不容易達到。這些原因都有可能削弱了企業進行捐獻的積極性。全球的經驗研究顯示，家族企業的控制形態本就多樣 (Granovetter 2005)；家族控制形態的差異所造成的政治獻金程度上的不同，在理論上值得未來學者推敲。

在有關企業菁英核心圈的兩個變項中，工商團體核心圈如預期，對於企業集團的政治獻金產生影響。然而董監事核心圈網絡與政治獻金卻呈現負向的影響關係，與既有美國社會的文獻發現並不一致，也頗令人訝異。這背後可能存在幾個市場制度差異的原由。首先，台灣的企業組織以家族控制為主，在網絡關係的傾向上，家族企業通常被視為具有比較高的封閉性 (Hamilton 1997; Greenhalgh 1988; Fukuyama 1995; Scott 1985)。這個與 Useem 等人探討的核心圈的概念，以專業的高階經理人所形成的社會網絡的脈絡頗為不同。而台灣的董監事任命，由於公司法對於最低股份持有的規定，使得董監事連結本身不像西方或日本等社會不需要牽涉到股權的持有，董監事跨坐的產生相對而言限制較少；在台灣，董監事連結本身就是一種公司股權重疊所形成的強連帶，這對於外部股權極為敏感且相對封閉的家族企業而言更容易因為信任感低，而不容易形成 (李宗榮 2009)。而台灣的企業家族在 90 年代末期之後，普遍避免讓家族成員以自然人身分擔任上市櫃公司的董監事，轉以採用投資公司等法人代表的形態出任，所委任者經常是非家族成員的人頭董監事，家族仍可以透過多層次持股方式控制股權。在這樣的新的持股策略之下，董監事網絡可能無法完全的反映企業間實質而隱性的社會關聯。總總這些制度與文化因素，都可能造成與西方社會相同的董監事核心圈的測量，卻導致不一致的分析結果。

本文的研究發現具有幾個限制。首先，本文的分析企業樣本來自

2006 年台灣前 503 個大集團（2008 年出版）；考慮以該年度數據做為分析樣本，主要是當年資料是此類名錄收錄範圍最廣的一次，這可以讓研究的推論範圍有更廣的基礎。然而本文的分析僅有單一年度的數據，而此類獻金資訊的揭露始於 2005 年，如何透過歷史數據的比較來探討企業政治獻金模式的變化，將能夠深化對於台灣政經體制變遷的瞭解；這是本文研究推論所可能有的時段限制。此外，立委與總統選舉同時進行，然本文僅針對立委選舉而非總統選舉的數據進行分析；而不同層級的選舉，對於企業的捐獻可能造成不同的誘因。尤其是台灣在總統制的體制下，立委的影響可能較為有限，企業對於立委的獻金可能接近買「保險」的目的，而非想要取得實質的政治影響。¹¹ 這些差異有可能會影響企業參與的程度，進一步影響本文論點的有效性；也是本文可能有的限制。不過，如果我們視政治獻金是企業與政治人物之間交往的社會後果，那麼分析立法委員的政治獻金的數據有可能更能夠釐清這些金錢往來背後的機制。這主要在於，總統選舉的候選人數少，政治獻金容易受到單一候選人的個人特質與民意聲望、選舉中常見的西瓜效應，甚至是總統候選人對於特定產業或企業的態度偏好所影響。相較起來，立法委員候選人人數眾多，與不同企業交往的社會空間更大，這會讓研究者所感興趣的解釋機制的展現有更廣的觀察機會。就此而言，選擇立委而非總統候選人的政治獻金做為分析焦點，可能更適合觀察企業與政治間互動的結構機會。不過這樣的看法仍需要未來更多的比較分析來檢視。

綜合本文的研究發現，我們似乎看到了台灣企業權力在政治領域中所展現出來的階級政治的跡象。一方面，以所有權的差異（家族控制與專業經理人控制）來檢視階級論與管理人主義的辯論，數據似乎顯示台灣的經驗更接近階級理論的預期。具有封建性質的家族企業仍然是政治金錢活動的主體。從產業的差異來看，資訊電子產業所帶來的新經濟可以視為台灣傳統舊經濟的破壞式创新的主要力量。縱使台

11 筆者感謝審查人之一提出這個對照的論點。

灣的市場環境中有四成左右（43%，236 個集團）的集團屬於資訊電子業，而且其政治傾向正如數據所顯示，明顯的遠離政治金錢的遊戲，然而這樣的「新經濟」力量仍然無法真正打破傳統家族企業對於政治獻金的主導。這似乎也造成台灣政治經濟環境中一個顯著的區隔：傳統的家族企業仍然盤踞著政治的場域，而以科技為主導的新經濟則自外於這個權力的遊戲。

就本文所觸及的階級政治的議題而言，顯然仍然需要學者更深入的經驗分析。而在未來的研究議題而言，至少有三個政治捐獻的相關面向值得繼續探索。首先是企業進行政治捐獻的整合與一致性的問題。這主要是環繞著企業是否能夠成功的進行集體行動，在權力鞏固上達成共識的議題；這也是當代政治社會學的文獻中，菁英論／階級論者與多元主義論的辯論核心。在經驗分析上，學者主要是著重探討企業之間在政治捐獻的對象或政黨的選擇上具有類似的程度。企業捐獻的一致性與共識的達成，通常也被視為企業凝聚政治權力的一個重要指標 (Mizruchi 1992; Burris 2005)。前述有關菁英核心圈理論以及階級論者的觀點中，皆強調社會網絡對於階級凝聚的促成作用。從政治凝聚力的角度分析，一個進一步檢視階級論邏輯的方式是探討核心圈理論所強調的企業菁英互動的上層組織，是否真正能夠對於企業社群的政治凝聚力產生作用。前述有關台灣企業集團核心人物在三大工商協會的參與以及政治獻金上的關聯，將可以透過網絡對偶等方式的分析進一步檢驗 (Lee and Lee 2011)。而在台灣這樣的華人市場環境中，非正式的關係連帶仍然是重要的連結因素，類似西方企業社群的社會網絡，在以家族企業為主的社會也可能有不同的替代形態。例如公司背後非正式的社會關係如親屬，可能是家族企業環境中得以促成階級整合的其他聯繫機制 (Zeitlin 1974)。本文發現大型家族企業是台灣政治捐獻的主導力量，而家族企業集團之間常見的親屬網絡等非正式的社會關係，是否在政治活動上成為促進階級整合的力量，都將是未來值得探索的議題 (Lee 2014)。

其次則是企業政治捐獻的黨派色彩 (political partisan) 的問題。根

據美國社會學者的研究顯示，企業的產業位置、物質利益的考量，以及菁英核心圈，甚至富有家族的區域與宗教族群背景，都對於企業捐獻給民主黨或共和黨的傾向造成明顯地差異性影響 (Clawson and Neustadtl 1989; Burris 1987; Burris and Salt 1990; Allen 1991)。從解嚴至今，台灣的社會已發展成為兩大黨主導的政治環境；然大型家族企業的發展在戰後與國民黨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這個歷史特性是否對於企業的政治捐獻產生某個程度的影響，將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題目。此外，本文分析數據主要是立委選舉的資料；然而，企業在面對例如總統跟立委選舉時進行獻金的目的可能會有所差異，尤其是台灣在總統制的體制下，立委的影響可能相對較為有限，企業對於總統與立委選舉政治獻金的動機與模式也可能會有所不同；針對企業在不同選舉時的政治獻金活動進行分析，也將有助於學者對於台灣企業的政治行動有更深入的了解。

最後，則是企業的政治捐獻，是否真正能夠達到政治影響效果的問題。很明顯的，政治獻金不會自動地對選舉的結果產生影響，它還必須要與其他機制一起作用。但美國的經驗顯示政治捐獻確實會影響選舉的進行。學者普遍認為，由於選舉經費花費金額的日益龐大，募款能力已經成為美國民主、共和兩黨決定選舉候選人是否出線的重要因素；也因此，金錢越來越成為選舉中關鍵的決定條件 (Domhoff 1998; Clawson et al. 1998)。此外，跟一般個人零星的捐獻相比，企業與富有家族的捐獻更為具體而且實在，且通常能夠經歷長時期的運作與國會的政治人物形成共生的關係。雖然無法總是按照企業的需求來立法，但企業仍然能夠透過幕後的運作與遊說來遂行企業意志的機會。透過政治獻金，大型企業與富有的家族能夠擁有更好的結構性機會來接近國會的決策過程，而使得其他社會團體的觀點逐漸被邊緣化 (Burris 2010)。而企業如果可以在捐獻的行為上取得共識，對於整體的利益取得更有幫助。美國學者 Mark Mizruchi 的研究以 1980 年代美國參眾兩院的法案審查資料進行分析，發現大型企業的政治捐獻行為越一致的產業，該產業的整體政治影響程度越高，許多有利產業的法案更容易

為國會議員所關注並通過立法 (Mizruchi 1992: Ch. 8)。在台灣企業政治捐獻的凝聚力是否也能轉換成政策上的優勢，也值得學者探索。從歷史回溯的角度而言，2008 年之後的台灣政局，一連串對於大企業優惠的立法連番在立法院通過，這些包括了產業促進條例對於租稅減免的資格放寬（2008 年）、調降遺產稅（2008 年）、調降營業所得稅（2010 年）等重大法案（林宗弘等 2011）。這些對於企業與富人的一連串稅法的優惠，成為加深日後台灣社會貧富差距的觸媒，也對數年之後的台灣社會與青年不滿埋下了火種。本文所分析的企業捐獻的活動，與這些攸關社會與經濟正義的法案最後通過的關聯為何，顯然是瞭解當今台灣社會現實的嚴肅課題。

台灣自從 90 年代開始至今，政治解嚴與經濟自由化已經超過兩個世代，整體社會見證了大型企業的興起與政治影響力膨脹的歷史過程。在全球社會的經濟不平等以及政府政策對於企業利益嚴重失衡的現在，台灣的經驗與全球政治經濟發展的步調顯得亦步亦趨，值得我們深究緣由 (Stiglitz 2012)。對於政治獻金的經驗分析，提供了我們衡量資本主義的發展與民主運作關係的一個窗口。也許台灣社會一般民眾對於財團或大型企業的政治影響的擔憂並非無的放矢；本文顯現出來的政治獻金模式證實台灣的民主政治正被日益壯大的金權政治所盤踞。如果政治獻金意涵著捐獻者對於受捐獻人的影響管道與機會，那麼這個管道正往金錢的金字塔上傾斜著。如何去監督並評估這個影響管道所帶來的實質政治後果，將是未來關心台灣政治與民主發展的研究者重要的任務。

附錄 模型解釋變項間的共線性診斷

變項名稱	變異數膨脹因素	容忍值 (tolerance)	R-squared
規模（營收）	1.80	0.55	0.44
集團年齡	1.68	0.59	0.40
資訊電子業	1.81	0.55	0.44
金融業	1.16	0.86	0.13
外銷比例	1.37	0.73	0.26
壟斷或寡占經驗	1.43	0.69	0.30
中國大陸公司數	1.45	0.69	0.30
工商協會核心	1.28	0.78	0.21
董監事核心	1.11	0.90	0.09
單家族	3.13	0.31	0.68
共治型	1.79	0.55	0.44
折衷型	2.74	0.31	0.68
高家族地位	1.57	0.63	0.36

平均 VIF=1.71 (n=503)

參考文獻

- 中華徵信所，2008，《台灣地區大型集團企業研究，2008 年版》。台北：中華徵信所。
- 王振寰，1993，〈台灣新政商關係的形成與政治轉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4: 123-163。
- 王鼎銘，2007，〈台灣政治獻金法及參選人政治獻金資料之實證研究〉。《選舉研究》14(2): 121-144。
- 司馬嘯青，1987，《台灣五大家族》。台北：自立晚報。
- ，2005，《台灣新五大家族》。台北：玉山社。
- 朱雲漢，1989，〈寡占經濟與威權政治體制〉。頁 139-160，收入蕭新煌編，《壟斷與剝削：威權主義的政治經濟分析》。台北：台灣研究基金會。
- 朱雲漢著、新菱菱譯，1992，〈台灣政權轉型期政商關係的再結盟〉。《中山社會科學季刊》7(4): 58-78。
-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1992，《台灣地區公平交易統計年報》。台北：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 李宗榮，2007，〈在國家權力與家族主義之間：企業控制與台灣大型企業間網絡再探〉。《台灣社會學》13: 173-242。
- ，2009，〈制度變遷與市場網絡：台灣大型企業間董監事跨坐的歷史考察 (1962-2003)〉。《台灣社會學》17: 161-217。
- ，2011，〈台灣企業集團間親屬網絡的影響因素〉。《台灣社會學刊》46: 115-166。
- 何明國，2009，〈大選獻金，遠東最大方，台塑只捐馬〉。聯合報，2 月 17 日。
- 林忠正，1989，〈威權主義下弱勢團體相互剝削的循環——台灣經濟體系的解剖〉。頁 161-196，收入蕭新煌編，《壟斷與剝削：威權主義的政治經濟分析》。台北：台灣研究基金會。
- 林宗弘等，2011，《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台北：勞工陣線。
- 吳介民，2009，〈中國因素與台灣民主〉。《思想》11: 141-157。
- 徐瑞希，1991，《政商關係解讀：台灣企業實用政治學入門》。台北：遠流。
- 陳柔縉，1999，《總統的親戚：台灣權貴家族》。台北：時報文化。
- 張茂桂，1992，〈人民、資本與國家：立法院與公共政策〉。《中山社會科學季刊》7(4): 15-33。

- 張琬喻、張凱雯，2011，〈董事政治關聯及政治獻金影響企業價值嗎？〉。《選舉研究》18(1): 139-174。
- 賴寧寧，2005，〈財團為什麼惹人嫌？民眾反財團四大理由全揭露〉。《財訊》284: 58-60/62。
- 謝國興，1999，《台南幫：一個台灣本土企業集團的興起》。台北：遠流。
- 彭懷真，1989，《台灣企業業主的「關係」及其轉變——一個社會學的分析》。台中：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顏吉利，1989，〈國營生產事業，巨型民營企業與資源使用效率——兼論建立自由、公平產業競爭環境之有效途徑〉。頁 119-138，收入蕭新煌編，《壟斷與剝削：威權主義的政治經濟分析》。台北：台灣研究基金會。
- Amsden, Alice H. 1985. "The State and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Pp. 78-106 in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edited by Peter B. Evans, Theda Skocpol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lford, Robert R. and Roger Friedland. 1985. *Powers of Theory: Capitalism, the State,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llen, Michael P. 1991. "Capitalist Response to State Regulation: Theories of the State and Political Finance in the New Deal."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 679-689.
- Allen, Michael P. and Philip Broyles. 1989. "Class Hegemony and Political Finance: Presidential Campaign Contribution of Wealthy Capitalist Famil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275-287.
- Baltzell, E. Digby. 1958. *Philadelphia Gentlemen: The Making of a National Upper Class*. New York: Free Press.
- Bell, Daniel. 1958. "The Power Elite-Reconsidere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4 (3): 238-250.
- . 1960. *The End of Ideolog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erle, Adolph A. and Gardiner C. Means. 1932.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New York: Macmillan.
- Boies, John L. 1989. "Money, Business, and the State: Material Interests, Fortune 500 Corporations, and the Size of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5): 821-833.
- Bond, Matthew. 2007. "Elite Social Relations and Corporate Political Donations in Britain." *Political Studies* 55(1): 59-85.
- Broyles, Philip A. 1993. "The Corporate Elite Goes to Washington: Presidential Campaign Contributions of Corporate Officer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2(1): 72-91.

- Burris, Val. 1987. "The Political Partisanship of American Busines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6): 732-744.
- . 1991. "Director Interlocks and the Political Behavior of Corporations and Corporate Elite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72(3): 537-551.
- . 2001. "The Two Faces of Capital: Corporations and Individual Capitalists as Political Actor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6: 361-381.
- . 2005. "Interlocking Directorates and Political Cohesion among Corporate Eli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1: 249-283.
- . 2010. "Corporations, Capitalists, and Campaign Finance." Pp. 247-262 in *Handbook of Politics: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in Glob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Kevin T. Leicht and J. Craig Jenkins. New York: Springer.
- Burris, Val and James Salt. 1990. "The Politics of Capitalist Class Segments: A Test of Corporate Liberalism Theory." *Social Problems* 37(3): 341-359.
- Chandler, Alfred D., Jr. 1984. "The Emergence of Managerial Capitalism." *The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58(4): 473-503.
- Chung, Chi-Nien. 2006. "Beyond Guanxi: Network Contingencies in Taiwanese Business Groups." *Organization Studies* 27(4): 461-489.
- Claessens, Stijn and Joseph P. H. Fan. 2002.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Asia: A Surve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e* 3(2): 71-103.
- Clawson, Dan and Alan Neustadtl. 1989. "Interlocks, PACs, and Corporate Conserat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749-773.
- Clawson, Dan, Alan Neustadtl and Mark Weller. 1998. *Dollars and Votes: How Business Campaign Contributions Subvert Democracy*.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Domhoff, G. William. 1967. *Who Rules America? Challenges to Corporate and Class Dominanc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 1972. *Fat Cats and Democrats: The Role of the Big Rich in the Party of the Common Ma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 1998. *Who Rules America? 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Year 2000* (3rd ed.). Mountain View, CA: Mayfield.
- Evans, Peter B. 1995.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ligstein, Neil. 1996. "Markets as Politics: A Political-Cultural Approach to Market Institu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4): 656-673.

- Fogel, Kathy. 2006. "Oligarchic Family Control, Social Economic Outcomes, and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7(5): 603-622.
- Fukuyama, Francis. 1995.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Free Press.
- Granovetter, Mark. 2005. "Business Group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Pp. 453-475 in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edited by Neil J.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reenhalgh, Susan. 1988. "Families and Networks in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Pp. 224-245 in *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aiwan*, edited by Edwin A. Winckler and Susan Greenhalgh. Armonk, NY: M. E. Sharpe.
- Hamilton, Gary G. 1997. "Organization and Market Process in Taiwan's Capitalist Economy." pp. 237-295 in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East Asian Capitalism*, edited by Marco Orru, Nicole W. Biggart and Gary G. Hamilton. New York: Sage.
- Khanna, Tarun and Jan W. Rivkin. 2006. "Interorganizational Ties and Business Group Boundaries: Evidence from an Emerging Economy." *Organization Science* 17(3): 333-352.
- La Porta, Rafael, Florencio Lopez de Silanes and Andrei Shleifer. 1999. "Corporate Ownership Around the World." *Journal of Finance* 54(2): 471-517.
- Lee, Zong-Rong. 2014. "Families United: Kinship Ties and Similarity of Political Donation among Business Groups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First European Social Network Conference (EUSN), Barcelona, Spain: INSNA, July 1-July 4.
- Lee, Zong-Rong and Shi-Rong Lee. 2011. "Political Cohesion under the Institutional Legacy of Developmental Stat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Firms in Transition in Taiwan, Academia Sinica, Taipei, October 28.
- Long, J. Scott. 1997. *Regression Models for Categorical and 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Luo,Xiao-Wei and Chi-Nien Chung. 2005. "Keeping It All in the Family: The Role of Particularistic Relationships in Business Group Performance during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50(3): 404-439.
- Lundberg, Ferdinand. 1937. *America's Sixty Families*. New York: Vanguard Press.
- Mills, C. Wright. 1956. *The Power Eli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zruchi, Mark S. 1992. *The Structure of Corporate Political Action: Interfirm Relation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izruchi, Mark S. and Deborah M. Bey. 2005. "Corporate Control, Interfirm Relations, and Corporate Power." Pp. 310-330 in *Handbook of Political Sociology: States, Civil Societies, and Globalization*, edited by Thomas A. Janoski, Alexander M. Hicks and Mildred A. Schwartz.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umazaki, Ichiro. 1986. "Networks of Taiwanese Big Business: A Preliminary Analysis." *Modern China* 12(4): 487-534.
- . 2000. "Chinese Business Enterprise as Inter-family Partnership: A Comparison with the Japanese Case." Pp. 152-175 in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State, Economy and Culture*, edited by Kwok Bun Chan. Singapore: Pearson Education Asia.
- Pfeffer, Jeffrey. 1972. "Size and Composition of Corporate Boards of Directors: The Organization and Its Environment."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7(2): 218-228.
- Pfeffer, Jeffrey and Gerald R. Salancik. 1978. *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 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Pittman, Russell. 1977. "Market Structure and Campaign Contributions." *Public Choice* 31: 37-52.
- Saxenian, AnnaLee. 2006. *The New Argonauts: Regional Advantage in a Global Econom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cott, John. 1985.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Research Design." Pp. 1-19 in *Networks of Corporate Power: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en Countries*, edited by Frans N. Stokman, Rolf Ziegler and John Scott. New York: Polity Press.
- Stiglitz, Joseph. 2012. *The Price of Inequality: How Today's Divided Society Endangers Our Future*. New York: W.W. Norton.
- Useem, Michael. 1984. *The Inner Circle: Large Corporations and the Rise of Business Political Activity in the U.S. and U.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ade, Robert. 1990.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ong, Joseph. 2011. *Betting on Biotech: Innovation and the Limits of Asia's Development Stat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u, Nai-Teh. 1987. *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 System : 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IL.
- Wu, Yu-Shan. 2007. "Taiwan's Developmental State: After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urmoil." *Asian Survey* 47(6): 977-1001.

- Yeh, Yin-Hua, Tsun-Siou Lee and Tracie Woidtke. 2001. "Family Control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Evidence from Taiwa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e* 2(1-2): 21-48.
- Zeitlin, Maurice. 1974. "Corporate Ownership and Control: The Large Corporation and the Capitalist Cla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9(5): 1073-1119.
- Zeitlin, Maurice and Richard E. Ratcliff. 1988. *Landlords and Capitalists: The Dominant Class of Chil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